



何介鈞

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

岳麓书社

3083

2

60

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

何介钧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管巧灵

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

何介钧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政院印刷厂印刷

199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00,000 印张：16.5 印数：1—1,000

ISBN 7-80520-699-6
K·134 定价：30.00元

湘新登字 007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黄土岭正街2号 邮编：410074

目 次

试论大溪文化·····	(1)
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	(8)
湖南省博物馆三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29)
关于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的分期问题·····	(42)
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	(52)
湖南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62)
石家河文化浅析·····	(67)
环珠江口的史前彩陶与大溪文化·····	(79)
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	(85)
商文化在南方的传播·····	(112)
试论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及商文化向南方传播的几个问题·····	(124)
湖南商时期古文化研究·····	(135)
中国古代陶鬲研究·····	(158)
古代越族的青铜文化·····	(179)
试论岭南青铜文化·····	(207)
关于湘西、湘西北发现的宽格青铜短剑·····	(215)
制造和使用铜鼓是濮系民族古代文化的特征·····	(221)
战国楚贵族墓葬制的几个问题·····	(228)
湖南晚期楚墓及其历史背景·····	(233)
关于楚蛮和楚族族源的断想·····	(240)
楚鬲试析·····	(247)
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	(256)
编后记·····	(260)

INDEX

- 1 On Daxi culture (1)
- 2 A Preliminary study of primitive cultures of Mid-Yangtze river district (8)
- 3 Thirty years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reseaches of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 (29)
- 4 On periodization of Guanmiaoshan type, Daxi Culture (42)
- 5 On the early Neolithic Culture of Dongting hu lake area (52)
- 6 Early Neolithic Culture site in Hunan Province (62)
- 7 On Shijiahe culture (67)
- 8 Prehistorical colour pottery in the Pearl River' s mouth area and Daxi culture
..... (79)
- 9 A secondary study of primitive cultures of Mid-Yangtze river district (85)
- 10 The spread of shan culture to the south (112)
- 11 On the shan brozen vessels unearthed from Hunan Province and the issues of
shan culture spreading south (124)
- 12 Study on ancient cultures of shan in Hunan Province (135)
- 13 Study on Li (tripot) of ancient China (158)
- 14 On brozen culture of anvient Yue people (179)
- 15 On brozen culture in Linnan area (207)
- 16 On brozen sword found in the west and northwest area of Hunan province (215)
- 17 The manufacture and use of brozen drum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Du
people' s culture (221)
- 18 Some problens on burial of Chu' s aristocrat Warring state period (228)
- 19 Chu tombs of a later period and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233)
- 20 Thoughts on the origin of Chu people (240)
- 21 Study on Li (tripod) (247)
- 22 Newly fownd Silk painting from chu tomb (warring state period) in Changsha
..... (256)
- 23 Afteruoucl (260)

试论大溪文化

1958年10月，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四川省巫山县大溪发现了一种有别于屈家岭遗址的文化遗存^①，被考古界称之为大溪文化。七十年代以来，大溪文化的遗址广泛发现，且有多处进行了正式发掘，从而为我们认识和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提供了一大批宝贵的材料。就目前所知，它的分布范围，西到四川巫山，东到鄂东的黄岗（黄岗螺丝山遗址文化内涵复杂，一部分被人认为与屈家岭文化相似的因素，不如说更接近于大溪文化的因素。如薄胎彩陶、碗盆盘等器物的器形），北到湖北江陵或许更北的京山，南到洞庭湖北岸。它跨越了大江南北，东西一千多里，而中心地区当在江汉平原西南部和洞庭湖北岸。

大溪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早晚期在文化面貌上不能不呈现若干明显的变异。由于近年来工作的不断展开和扩大，对大溪文化的分期有必要也有条件进行了。

大溪遗址发现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文化，但由于当时同类型的遗址均未经发掘，因此无法断定大溪遗址在整个大溪文化中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人们注意到，在大溪墓葬的随葬物中有不少与屈家岭遗址（早期）出土物类似的东西，当时以为是受屈家岭文化的影响所致。其实，这些完全是大溪墓地所处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在大溪墓地的出土物中，有些什么是能反映时代特征的东西呢？除大溪文化的共性以外，大概还有以下几点：1. 泥质红陶仍为主要陶系，但泥质黑陶和灰陶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泥质黑陶大有取代泥质红陶的趋势。2. 彩陶明显地处于衰落和退化的状态，多比较简单的绚索纹、平行条纹和横人字纹。有在红陶上饰白衣，然后绘红、赭色彩的。3. 纹饰除彩绘外，尚多瓦棱纹、弦纹和镂孔，并出现了少量条纹。4. 虽然圈足器和圜底器特别发达，但平底器和三足器增多。卷沿、尖唇（唇内似经刀削）、圜底下坠、球形腹是当时陶器器形上流行的作风。已经使用慢轮修整。5. 有一组典型的器物群：彩陶筒形瓶、黑陶曲腹杯、红陶或黑陶卷沿球腹簋形器、小口长颈鼓腹平底壶、瓦纹陶罐、敛口圆腹盂、圆锥足或扁锥足小鼎、斜肩直腹矮圈足小瓶、敛口平底红陶瓮、小口高领红陶罐、卷沿平底盆、坠底高圈足红陶碗（豆）、腰部内弧形收缩的器座、算珠式捉手的器盖等。6. 出土有少量器表施朱绘的磨光黑陶。7. 有极少的有肩石斧。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横断面呈梭形的石斧（江汉平原南部和洞庭湖区）和打制凹腰带肩石锄（三峡地区）。出现了较厚的扁平穿孔石铲。8. 开始形成用小型明器随葬的习俗，但一般的情况是明器和实用器同时入葬，且以实用器为主。9. 陶环较普遍地出土。

从上述数点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中不少是屈家岭文化同样具有的特点。尔后，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发现湖北省松滋桂花树遗址的大溪文化层大部分包含物与大溪墓地十分接近^②。而在湖南省澧县梦溪三元宫^③和湖北省宜都红花套遗址^④，都有属于这一期的地层。在三元宫，它是属于晚期地层的前一段（发掘经验不足，分层过粗）。1966年试掘时出土了一些完整器物，估计是墓中物，有彩陶筒形瓶、红陶簋形器、红陶小口直壁瓶等，时代大体相近^⑤。红花套遗址的大溪文化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的同志将其分为三大期，它的第三期与大溪墓地的特点基本相同，应属一个发展阶段。其下压着同属大溪文化但比大溪墓地要早的地层。因

此，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大溪墓地是属于大溪文化最晚期的遗存，它已处于新文化临产的前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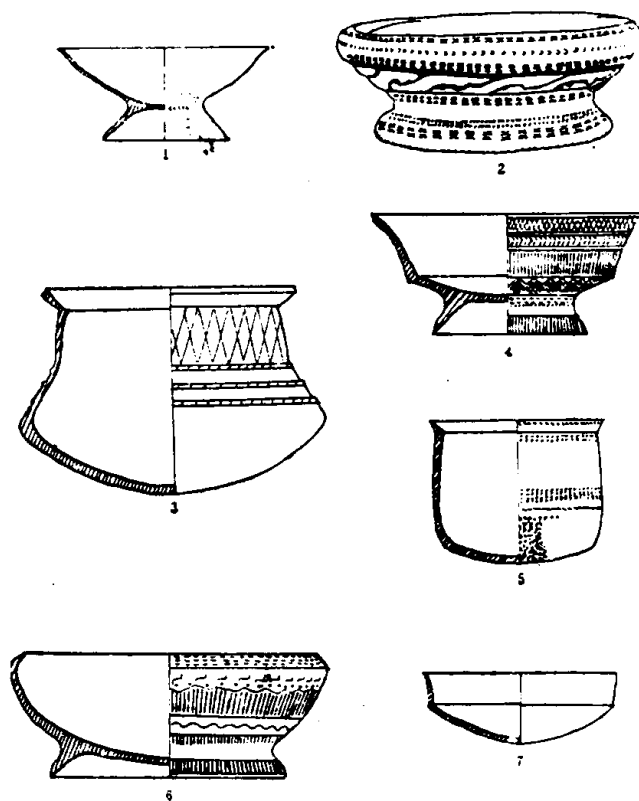
从大溪墓地出发，沿着历史的长河上溯，与它最接近的一站是湖北省江陵毛家山遗址^⑥，同时还有红花套遗址第二期遗存、湖南省安乡汤家岗遗址^⑦上层、湖北省枝江县关庙山遗址1980年发掘划分的第四层。红花套遗址发掘面积达三千多平方米，复原器物甚多，它的第二期地层直接被第三期所叠压，从而确定了它们时代先后的相对关系。而汤家岗遗址的中层、红花套遗址的第一期遗存、梦溪三元宫遗址的中期地层、关庙山遗址1980年发掘划分的第五层时代略早，但相距不会太远，可以视作这一期的前段。综观这一期出土物的共同特点，结论是：1. 泥质红陶数量在各陶系中占第一位，同时存在一定数量的泥质黑陶和灰陶。毛家山遗址中泥质红陶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一，泥质灰陶占百分之五点六，泥质黑陶占百分之十一点九。另有少量的泥质或夹细砂的白陶，很能反映这一期陶系的一般情况。2. 是彩陶最繁荣的时期。花纹除平行条纹、绶索纹、水波纹外，极多各种复杂的漩涡纹，有受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圆点弧线勾叶纹，还有在两道平行条纹中加涂白色陶衣，然后绘红黑彩圆点弧线勾叶纹的。这一期另有一种极具特色的极薄橙黄胎彩陶。主要器形为敛口弧壁矮圈足碗和侈口鼓腹矮圈足带把杯。彩为黑色和赭色。有先用模印出凸凹，然后施彩的。除极个别的有内彩外，均施于器物外表。花纹有圆点、网纹、羽状纹、宽带纹等。这种薄胎彩陶，是这一期特有的器物。3. 出现了鼎。这一期的鼎足多为圆锥形和横断面呈长方的扁锥形，上部多为釜形。在這一期的后段，出现了较小型的鼎。4. 豆形器和平底器开始出现。豆盘较深，呈直壁钵或敛口钵形，圈足为直筒形或稍呈喇叭形。质地多泥质红陶，也有在圈足上绘彩的。平底器数量尚少，主要为平底钵和盆。5. 有一组造型具有特色的陶器群，其中有长弧壁红陶簋形器、内折沿坦腹红陶盘、敛口收腹红陶盆、宽折沿斜直壁平底盆、卷沿鼓腹平底盆和钵、仰口有肩斜直壁深腹红陶碗（豆）、高大圈足深盘红陶豆、腹底布满甗眼的红陶圜底釜形甗。器盖的式样极多。后段器盖的捉手多为带帽束腰式和杯式，前段的器盖多为倒扣碟形，有的捉手为带帽束腰式，类似庙底沟类型小口尖底瓶瓶口。器座为较矮、中腰稍鼓的圆筒形，有镂孔。特别具有分期意义的是，在这一期出现了两种新的器形：筒形瓶和曲腹杯。这时的筒形瓶素面、粗矮无明显束腰；曲腹杯为泥质红陶，外红内黑，一般为侈口，腹部圆转没有棱角，下部壁斜直。这两种器形，都处于它的原始形态。这一期的陶器流行圈足中部微鼓、内折沿、沿外如同刀削、压印浅弦纹等作风。6. 镂孔已很发达，有圆、半圆、新月、三角、长方等多种形式，并有在圆形镂孔周围加一圈锥点装饰的。7. 石器制作中产生了穿孔技术和砥断法。8. 篋点纹空心陶球出现。

关庙山遗址近几年来连续进行大面积发掘，出土遗迹和遗物均极为丰富，它的大溪文化地层为分期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新资料。1980年发掘共划分七层，其第六、七层在时代上明显地早于第四、五层，也就是早于以毛家山遗址为代表的一期文化遗存^⑥。与此相近的有江陵蔡台遗址第五层^⑧。但由于这两个遗址的材料均未公布，不便作为分期的依据。梦溪三元宫遗址下层虽同属此期，但完整器太少。幸喜1979年冬发掘的湖南澧县丁家岗遗址上层和这一层的部分墓葬（约十来座）文化内涵和关庙山遗址的早期基本相同，这些出土物比较完整，材料又为笔者所易于取得，因此，暂且作为分析此期特点的代表。这一期，1. 泥质红陶数量上占统治地位，有极少量泥质黑陶和灰陶，部分遗址中另有少量泥质或夹细砂的白陶。丁家岗遗址此期墓中出土近百件器物，有两件白陶器，一为圈足盘，一为圜底近平的仰角钵。2. 开始出现了彩陶，但彩绘花纹尚极简单，多为宽带纹。陶器纹饰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刻划的粗弦纹、

网纹、竖条和斜条纹以及镂孔等。3. 红陶经打磨光亮，并施以鲜红或深红的陶衣，碗、盆等器往往呈现外红内黑等大溪文化触目可见的特点在这一期正式形成。这一期的陶衣比以后的各期更艳更亮而不易剥落。4. 有相当数量的厚胎红陶，表面也经打磨并施陶衣，而胎质却成炭黑色，且疏松成层，似为麝和了草末烧造而成。5. 陶器器类多圈足器和圜底器，尚未见平底器、豆形器和鼎。圈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碗、盆，器形格外多样。最有特点的一种是口微敛、外沿似经刀削，斜直壁、矮圈足、壁与圈足交接处有深凹槽；另一种敛口、鼓腹、最大径偏上、矮圈足；第三种敞口、腹壁起棱折，形似双腹。关庙山遗址出有此式盆数件，圈足分成三组，似三个矮扁平足。除此以外典型的器物还有倒扣碟式的器盖、腰部微鼓似圆桶、施粗凹弦纹和镂孔的高型器座以及敛口、大圆唇、外施粗凹弦纹和竖条纹、圜底的厚胎锅形器。这一时期陶器流行矮圈足，镂孔已经开始发达。在部分器物的口沿往下有四道等距离的纵向黑带、但非彩绘，也许与当时陶窑的构造和烧制方法有关。6. 石制生产工具主要品种为石斧。锛和凿极少，不见石铲。7. 在玩具和装饰品中，篦点纹空心陶球、陶环均未见出土，但往往有敲打而成的圆陶饼。

在安乡县汤家岗遗址的下层和同一层次的十座墓葬中^①，有着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器物。陶器的陶系，除泥质红陶和麝草末的黑胎厚红陶外，还有少量泥质或夹细砂的白陶，有一定数量火候很低、质地疏松、表面红黑斑驳的泥质褐胎陶，反映着陶器烧造技术的原始。不见纯净的泥质黑陶和灰陶。成为大溪文化陶器十分鲜明特点的“外红内黑”，在这一时期尚未见到。镂孔不发达。器形几全为圜底器和圈足器。器形式样不多，主要有侈口有颈斜肩折腹圜底釜、敛口或内折沿圈足盘和盆、敞口坦腹内弧壁圈足碗、弧壁或内弧壁圜底钵、侈口直腹戳印纹圜底罐等。不见彩陶。主要装饰方法为刻划、戳印和模印。有一种白陶盘，常用模印、刻印和戳印（单用或并用）的方法饰以极精致繁复的图案花纹，如X纹、S纹、圆圈纹、波浪纹、折曲纹、链条纹、网纹等，且有戳印的小方格作为地纹。令人十分惊奇的是这一期模印在装饰手法上占有重要地位，印出的图案单元之间布局匀称，从无上下挪位、重叠现象。1979年冬发掘的澧县丁家岗遗址下层同属这一期，并出土了三座墓葬，进一步证明了它在时代“标杆”上的位置。湖北省公安县王家岗遗址下层也出土了类似的陶片，少数可以复原，时代也许相近。这一期的墓葬仅随葬陶质生活用具，不见石器。地层中石器数量也很少，仅见厚而短的手斧、利用卵石剖开稍事敲打而成的敲砸器，并发现较多的燧石小石片和石核。当时是否较多地使用易于加工的骨、木器？因这些质料的器物在带酸性的土壤里难以保存，因而无法确定。

这一期文化遗存，在各遗址中都是压在最底层。它具有了大溪文化的某些共同因素，有理由认为它是大溪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目前所见的大溪文化的最早期。但大溪文化的一些特征



图一 大溪文化第一期典型陶器

1、4. 碗 2. 白陶盘 3. 釜 5. 罐 6. 盆 7. 钵
(1、3、7澧县丁家岗遗址出土，2、4、5、6安乡汤家岗遗址出土)

性因素，有好些在这类遗存中尚未具备。因而又有可能认作是与大溪文化有别，比大溪文化更早的一类原始文化遗存。由于发现还不多，材料不够丰富，可以暂不另外命名。不过它对探索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一个十分值得珍视的启示和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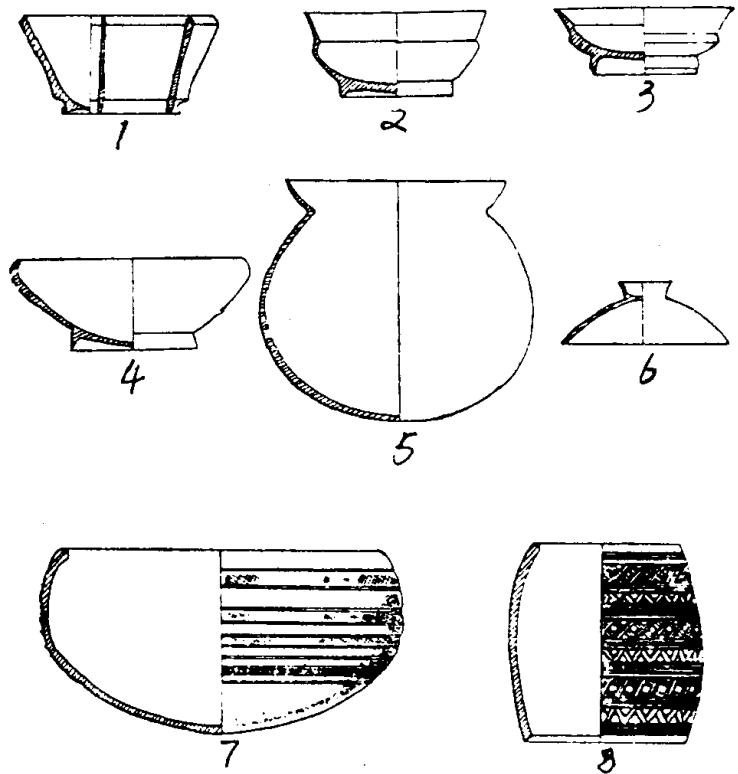
这样，我们可以把现已发掘的属于大溪文化的遗存划分为四期。即：第一期，以汤家岗早期墓葬、下层地层、丁家岗遗址下层及同层的墓葬为代表（图一）；第二期以关庙山第六、七层，蔡台第五层，丁家岗遗址上层和三元宫下层为代表（图二）；第三期以毛家山遗址，关庙山遗址第四、五层，红花套遗址一、二期文化遗存，三元宫中层为代表（图三）；第四期以大溪墓地、桂花树遗址大溪文化层、红花套遗址第三期遗存为代表（图四）。

目前，大溪文化第一期遗址发现的地区，局限在洞庭湖西北岸和江汉平原的西南部。关庙山可见到第一期特点的若干遗留，而第二期遗址仅发现在三峡以东。三峡内所见，如青鱼背、中堡岛等，都只能早到第三期，而巫山大溪，则更晚了。能否由此推论出大溪文化最早起源于江汉平原西南部和洞庭湖西北岸，以后逐渐向东向西、向北发展呢？限于目前的资料只能是一种假设。

关于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关系，自来争讼甚多。笔者认为：屈家岭文化和大溪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系统的两个发展阶段。屈家岭文化是直接承袭大溪文化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在《澧县梦溪三元宫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的结论中曾初步表述了这一观点，现再作进一步阐述。

首先从两种文化各期的内在特点来进行分析比较。属于公认的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形，如扁圆腹和折腹的壶、双腹的豆、鼎、盆，几乎全部出现在它的晚期。这些典型器形，与大溪文化的器物相距甚远，其中定有中间环节。在大溪和屈家岭文化中同时存在的蛋壳彩陶，往往造成人们的迷惑。但如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无论就胎质、火候、器形、纹饰部位和手法，都全异其趣。而且大溪文化中它是流行在第三期，与屈家岭文化晚期在时间上相距很远，并未发生直接联系。而屈家岭文化早期，若以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的早期遗存为典型的话，确有相当多的因素与大溪文化相似。李文杰同志在《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载《考古》，1979年2期）一文中，概括地列举了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其实，所列举的几点，是荦荦大者，其它能举出的相似之处还很多。只是由于李文杰同志在文中没有对大溪文化进行分期，因此，人们无法弄清屈家岭文化早期究竟和大溪文化哪一期最相似。我认为：主要是和大溪文化最晚期，也就是第四期相似。

这些相似，是相互影响还是承袭关系，是谁承袭谁呢？追本溯源，可以看出，是屈家岭文化早期承袭大溪文化晚期发展而来。为什么？1. 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似特点，在大溪文化的



图二 大溪文化第二期典型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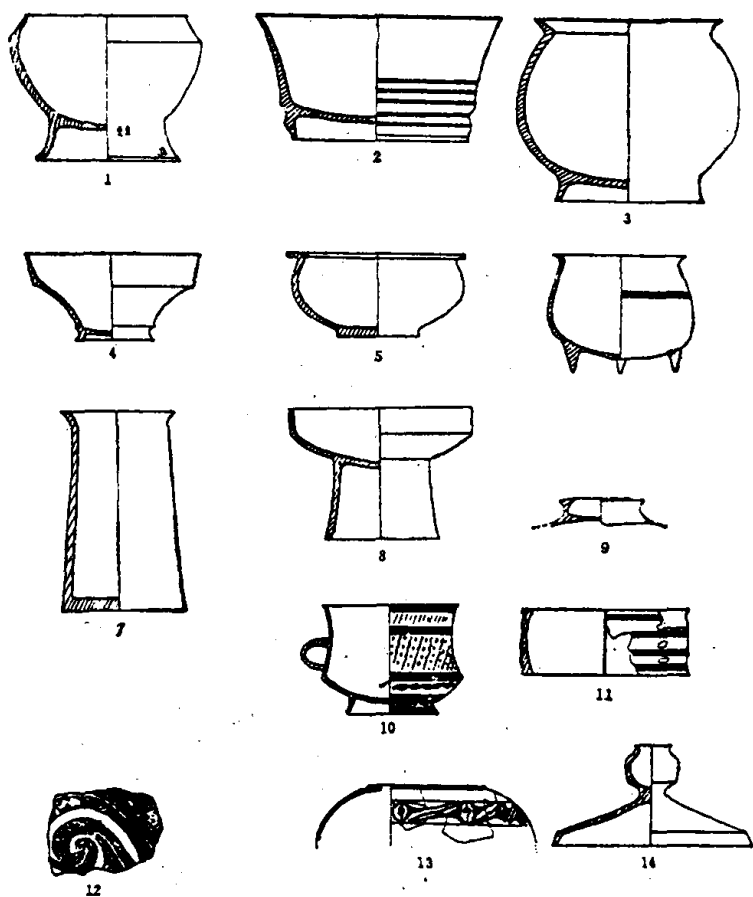
- 1、2、3、4. 盆 5. 釜 6. 器盖 7. 锅形器 8. 器座 (1、2、3、4、8 澧县丁家岗遗址出土，8 参照关庙山同类器形复原。5、6、7 梦溪三元宫遗址出土)

更早阶段即可找到其原始形态和萌芽状态。如曲腹杯、簋形器、穿孔石铲、圭形石凿、篦点纹的陶纹轮和陶球等。因而可以说是大溪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2. 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大量特点和器物可以从大溪文化整个的发展趋势中找到其演变轨迹。如大溪文化中黑陶由少量到具有一定数量,再到占有相当大比例,最后发生质变,发展到屈家岭文化早期,黑陶占各陶系的第一位。又如三足器、平底器、卷沿的器物,在大溪文化第一、二期中不见。第三期中少量出现,第四期较多。发展到屈家岭文化早期,成为大量的存在。而圆底器,则发生正好相反的变化。厚胎彩陶在大溪文化各期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繁荣,然后又走向衰落退化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到屈家岭文化早期则只在个别遗址中有极少量的遗留了。簋、盂、壶等器形分别出现于大溪文化第三、四期,其腹部由长弧渐变成球腹,至屈家岭文化早期,变成最大腹径在下部的扁圆形,可以清楚地找出其发展序列。

现在我们所知属于屈家岭文化的 C^{14} 年代测定有黄棟树、青龙泉、屈家岭

三个地点共五个数据^①。其中最早的一个数据为 ZK—430 青龙泉遗址 II 区 F1 柱洞 2 木炭 2550B. C. ± 200 , 如经树轮校正, 当在 3000B. C. 左右。这五个数据全属屈家岭文化晚期。属于大溪文化的 C^{14} 测定, 有关庙山、红花套两个地点共六个数据^②, 除 ZK—352 红花套遗址 T110 第五层 F301 内泥炭混合物年代偏晚, 不能作为依据外, 最晚的一个数据为 ZK—686, 同样采自 T110 第五层 F301 内的木炭标本, 年代为 4660 \pm 300, 若经树轮校正, 当在 3300B. C. 左右。红花套遗址的第五层应是该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 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大溪文化最晚一期。大溪文化第三、四期, 明显地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 特别表现于彩陶的纹饰和尖底瓶口式的器盖捉手, 说明时代当相去不远。而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有多个 C^{14} 测定数据, 表明为距今 5300—6000 年左右, 因此, 红花套遗址第三期遗存年代数据我认为是比较接近于真实年代的。这样, 在大溪文化第四期 3300B. C. 和屈家岭文化晚期 3000B. C. 之间, 如果插上屈家岭文化早期二到三百年的发展延续时间, 那就正好衔接起来。

其次, 我们再分析一下两者的地域分布。这两种文化, 在不少地区是重合的, 不仅是屈家岭文化晚期, 或者如有的同志所说“具有屈家岭晚期因素的那一类遗存”, 即使屈家岭文化早期, 两者也在不少地区重合。原来认为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址, 仅有武昌洪山放鹰台、京山朱家咀和屈家岭三处。其实不然, 在原属大溪文化分布区里, 近几年发现了好几处屈家岭文



图三 大溪文化第三期典型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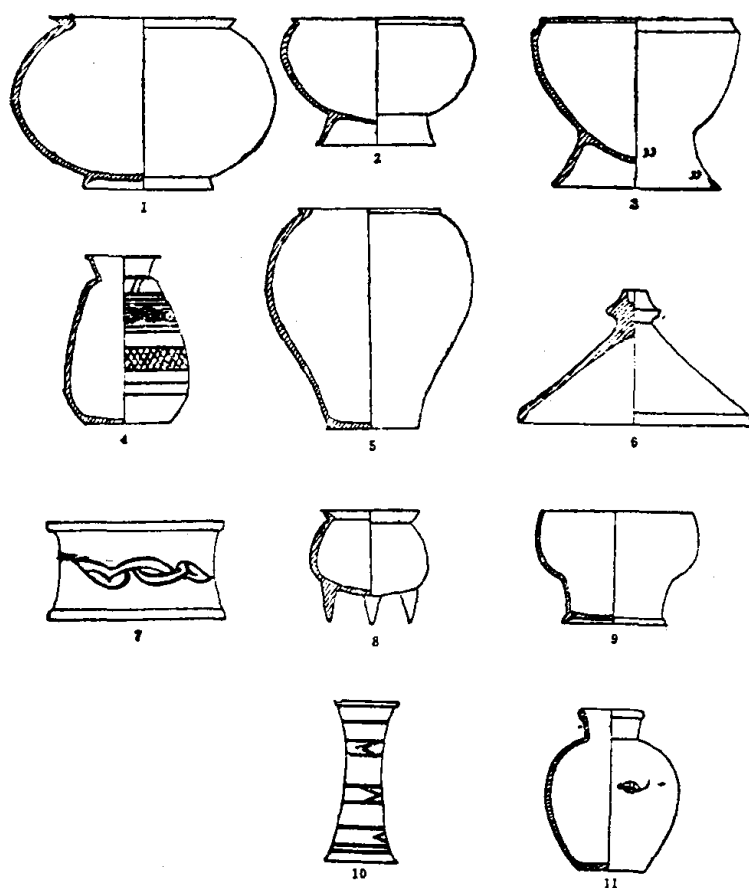
- 1、2、5. 碗、盆 3. 簋形器 4. 曲腹杯 6. 鼎 7. 筒形瓶
8. 豆 9、14. 器盖 10. 薄胎彩陶杯 11. 器座 12、13. 彩陶残片

(1、3、4、6、7 毛家山遗址出土, 2、10 丁家岗遗址出土, 其中杯上花纹根据其它残片复原。5、8 汤家岗遗址出土, 9、11、12 梦溪三元宫遗址出土。13、14 关庙山遗址出土)

化早期遗址和墓葬，如湖北公安王家岗的上层墓葬^⑤、湖南安乡度家岗的墓葬^④、安乡划城岗遗址的中一期地层和同时期的墓葬^⑥等。它清楚地说明，屈家岭文化在原大溪文化的基础上诞生，范围稍有扩大。到晚期时，分布范围急剧增加，以致传播到原是仰韶文化区边缘的鄂北、豫西南去了，并且在一些地区（例如汉水中游）得到更充分的发展，特征更加明显、丰富。

更有说明力的证据是地层叠压关系。在安乡划城岗遗址发掘了一百一十四座原始时期的墓葬，分别属于大溪文化第四期、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大溪文化第四期的墓葬打破更早阶段的大溪文化地层，而大溪文化第四期地层又被屈家岭文化早期墓葬所打破。其中有两座属大溪文化第四期的墓（M41和M46）直接被屈家岭文化早期墓M40和M34所叠压，它们各自出土了一组有时代特征的随葬器物。M41和M46主要随葬陶器是泥质红陶，有彩绘，并有大溪文化晚期常见的“外红内黑”口沿稍外卷的泥质红陶碗、扁锥足夹

砂褐陶小鼎、球腹簋形器，器物上的彩绘也是大溪文化第四期常见的绚索纹、平行条纹、网纹等。而M40和M34与其它同期的八十来座墓一样，出土物几乎全是黑陶和灰陶，有曲腹杯，直壁瓶，小鼎、甑、盂、扁圆腹簋形器等。这种地层叠压关系，是十分有力的证据，证明两种文化直接的承袭。可能还有别的遗址也有这种地层关系，但由于两个原因未能被注意和承认。原因之一是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在很多因素上相似，因此，往往将屈家岭文化早期当作大溪文化晚期处理了。原因之二是，由于屈家岭文化存在着不同的类型。现在人们视作标准的屈家岭遗址，它地处大溪文化分布区之外，大溪文化的传统比较少，而仰韶文化的影响又较多，因此，它具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有些特点，不仅江汉平原西南部和洞庭湖北岸的屈家岭文化的遗址不具备，即使一直被人们承认的武昌放鹰台遗址也不具备或者不尽相同。因此，屈家岭遗址只能认作为屈家岭文化的一个类型。而原大溪文化区特别是中心部位的遗址，因袭成分更多，它的屈家岭文化早期甚至晚期，必然有更明显的大溪文化的胎记，因而形成为有别于屈家岭遗址的另一类型。这一类型与屈家岭遗址早期遗存明显的区别是：1. 陶系虽同样以泥质黑、灰陶为主，但还保留一定数量的泥质红陶。2. 除具有屈家岭遗址早期地层的基本器形外，还有一些本类型特有器形：小口直颈壶、直壁瓶等。这南、北两个类型的区分几乎延续到以后的整个新石器时代。但它们的共同性是主要的，不同之处并不能构成两种不同的文化。



图四 大溪文化第四期典型陶器

1. 簋形器 2、3. 碗 4. 瓶 5. 瓮 6. 器盖 7. 器座 8. 鼎
9. 曲腹杯 10. 筒形瓶 11. 罐 (1、2、4、6安乡划城岗出土，
3、5、6、7、9、10松滋桂花树遗址出土，11巫山大溪遗址出土)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到大溪文化已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大溪文化分布范围广阔，势必有类型的区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关系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成分，远不能说已经解决。这些都有待我们去努力探索，使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原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年）

注 释

- ① 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1961年11期。
- ②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3期。
- ③ 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4期。
- ④ 林春、谢文纶：《红花套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待刊稿。
- ⑤ 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72年2期。
- ⑥ 纪南城文物考古发掘队：《江陵毛家山发掘记》，《考古》1977年3期。
- ⑦⑩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待刊稿。
-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1980年发掘资料。
- ⑨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1979年发掘资料。
- ⑪⑫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五）、（六）、（七），分别载《考古》1974年5期、1978年4期、1979年1期、1980年4期。
- ⑬ 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1979、1980年发掘资料。
- ⑭⑮ 湖南省博物馆1978年和1979年发掘资料。

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

长江，从摆脱了三峡的羁绊之后，进入了它的中游。从此一泻千里，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它相继接纳了清江、沮漳河、澧水、沅水、资水、湘水和汉水，形成了沃野无边的江汉平原和与之相连的洞庭湖平原。这里湖泊星罗、河港密布、地势平坦、雨量充沛、土质疏松、便于开垦，是人类幼年时代理想的生活场所。

长江流域曾经长期被人们不公正地认为是开发较晚的地区。近些年来，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地区相继发现了具有独特风貌、自成体系的原始文化，人们耳目才为之一新，逐渐认识到长江和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伟大摇篮。

长江中游原始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比起下游地区，开始得更晚近，研究得更不充分，但从现有材料看来，长江中游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重要的、光辉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对我国整个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研究和探索楚文化的渊源，有着重大的意义。有必要加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由于现在发表的材料不多，这种分析研究工作只能是初步的、疏阔的。不少论点，可能被今后的考古实践推翻和修正。

一、长江中游原始文化的发现及其特征

长江中游原始文化的发现，始于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1954年，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配合石龙过江水库工程，调查发现了这一遗址。1955年2月，进行试掘。1956—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发掘^①。由于它的文化内涵和中原地区原始文化有着明显不同，具有较多自身的特征，因此，考古界公认是一种新的系统，并定名为屈家岭文化。属于这种文化的遗址，经过正式发掘和试掘的，已有数十处，如：湖北京山朱家嘴^②、武昌放鹰台^③、均县观音坪、钟祥六合^④、郧县青龙泉^⑤、大寺^⑥、天门邓家湾、土城、渡闸、襄阳三步二道桥、宜昌李家河、中堡岛、青鱼背^⑦、宜都红花套^⑧、枝江关庙山^⑨、松滋桂花树^⑩、公安王家岗^⑪、河南浙川下王岗^⑫、黄楝树^⑬下集^⑭、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⑮、安乡县度家岗^⑯、划城岗^⑰、华容县长岗庙、车轱山等。在这些遗址里，均发现有属于屈家岭文化的地层或墓葬。它的分布范围，北界达到了河南南阳地区，南界至少到了洞庭湖北岸，东界到了黄冈和黄石一带，西界直到三峡。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即出有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高圈足杯，可能有屈家岭文化的遗存。《京山屈家岭》曾估计这一文化遗存的分布“向北到了大别山和桐柏山一带，向西到武当山、大巴山附近，向南当过江陵，向东似到达黄冈、鄂城以西地区”。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来，实际分布范围的北界、南界、西界均比这一估计超出了很多。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广阔，地区差异较大，而且带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在文化面貌上呈现出一种急剧变化的状态，因此很难简单地概括它的特点和全貌。大体说来，这个时期，在原始农业中已经普遍地种植了水稻。屈家岭、朱家嘴、放鹰台等遗址在这一时期地层的红烧土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秆的痕迹。屈家岭遗址晚一遗迹二更是在2000立方米的烧土中发现麝和大量稻谷壳，以致

密结成层^⑨。这和相邻的仰韶文化区主要种植旱粮全然不同。横断面呈圆角长方形，圆角方形和椭圆形、梭形的磨制石斧是主要农耕砍伐工具；适应着冲积平原土壤疏松的特点，扁平穿孔石铲成为常见的翻土农具，部分演变成亚腰形石钺的形式，并随葬入墓，显示了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扁平梯形石斨和各种形式的石凿是当时流行的手工工具，还有小型斜刃锋利的切削器（或雕刻器）；出现了柳叶形的石镞，但少见石刀、石镰等收割工具；石器的穿孔，切割和抛光技术均已成熟，陶纺轮出土极多，除早期有少量厚重型外，一般均较薄。从早期开始，陶器即普遍采用慢轮修整，胎壁均匀，大部分器形规范化。在各种陶系中，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两者总和占70%—80%。多圈足器和凹底器，有一定数量的平底器和三足器，较少圜底器；三足器仅鼎一种。常见的陶器器形有盆、碗、壶、盂、盘、鼎、豆、罐、缸、杯等。属于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有长颈扁圆腹圈足壶、高圈足豆、直壁高圈中杯、弧壁矮圈足碗、盂形器、卷沿凹底盆、厚胎缸等。鼎的式样甚多。上部有釜形、罐形和敞口圜底盆形。足有圆锥、扁锥、鸭咀，柱形和扁平两侧内卷等多种。大量器形呈现仰折弧壁（即双腹）和扁圆腹、折腹的特点。从早期到晚期都可见到一种施篦点纹的空心陶球。陶器纹饰最多弦纹，另有少量篮纹、绳纹和附加堆纹，晚期部分遗址出土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薄胎彩陶和彩绘纺轮。多缕孔，主要是圆孔，也有长方形，新月形孔。出土有石祖或陶祖^⑩，说明盛行男性崇拜。氏族公共墓地就在居住地边沿。葬式有直肢葬，也有屈肢葬，一般为单人葬，难以见到墓坑。少数清理出的墓坑为长方浅竖穴。小孩的瓮棺或有专门的墓地，或夹杂在成年人墓葬当中。葬具多为瓮、罐上盖以盆、钵、鼎或豆盘。房屋建筑出现了长方多间的复杂形式，有大至70—80平方米，多至29间的。地面和墙壁均用红烧土块铺垫或者涂抹草泥后用火焙烧，室内多有红烧土平整的土台。

1958年10月，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巫山县大溪发现了一种有别于屈家岭遗址的文化遗存。1959年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在这里作了发掘工作，重要的收获是发掘了74座时代相近的墓葬^⑪。由于当时其它地区的工作尚未展开，因此，这种类型的遗址曾被认为仅仅局限于三峡地区。1975年四川省博物馆又在这儿发掘了大批墓葬，使墓葬总数达到了207座^⑫。1973—1975年，长办考古队在湖北省宜都红花套进行了发掘^⑬。其文化内涵和大溪墓地略有不同，曾有人称之为“红花套文化”。1974年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包含有几个时期的遗存^⑭，也有人称之为“梦溪文化”。七十年代，与大溪遗址同类的遗存广泛发现，有不少进行了正式发掘，成为长江流域原始社会考古最可喜的收获，从而也为我们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提供了一大批宝贵的材料。特别是松滋桂花树、枝江关庙山、安乡划城岗、公安王家岗等遗址的发掘和清理，证明了所谓“红花套文化”、“梦溪文化”只不过是“大溪文化”不同阶段或不同地域的遗存，于是大溪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最后得到了确认。就现在所知，经过调查和发掘属于大溪文化的遗址，除以上列举的外，还有：四川巫山县城、湖北秭归朝天嘴、宜昌中堡岛、青鱼背、四渡河、杨家湾^⑮、江陵县毛家山^⑯、朱家台、蔡家台、监利县柳关^⑰、湖南澧县丁家岗^⑱、临澧县沙堤、安乡县汤家岗^⑲、划城岗^⑳、南县南湖^㉑、华容县车轱山、岳阳县君山^㉒等。如此看来，大溪文化比初发现时估计的范围要广阔得多，它跨越了大江南北，但主要在长江两岸，西至三峡，东至洪湖西岸。大溪文化的特点十分突出。无论是与邻近地区同时代的文化，还是和同一地区不同阶段的它种原始文化，在内涵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在澧县梦溪三元宫、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监利柳关等遗址的建筑遗迹红烧土中，或者在粗厚陶的罨和料中，都发现有稻草谷壳的痕迹。

巫山大溪和三峡内其它遗址中出土大量鱼骨和捕鱼工具，似与其滨临大江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大溪文化的石器中，有较多的巨型石斧，横断面呈圆角长方形，厚椭圆形，顶端圆。三峡地区和大江边的诸遗址，由于石料来源充足，石器特多，大型，有的主要打制，仅刃部稍事磨过，有一种大型打制凹腰带肩石锄。江汉平原其它地区和洞庭湖区石料缺乏，因而石斧体型稍小，磨制精致。也可能更多地使用骨、木等质料的工具。晚期出现圭形石凿和较厚的穿孔石铲，穿孔技术不发达。房屋建筑采用编竹夹泥的方式，内外焙烧。地面铺垫红烧土块，墙基和立柱下的沟、洞中也常填筑红烧土。这大概与南方雨水多有关。房屋形式有两大类，一类为大型房屋，多为长方形的半地下建筑，面积可达50—60平方米，估计是氏族成员公共活动的场所。另一类为小型住宅，有圆形、椭圆形和圆角方形，多半地穴式，面积一般仅6—8平方米左右。室内有圆形或瓢形灶炕和红烧土的平台，疑作睡觉之用。在遗址里常有面积不大的成堆红烧土，估计是陶窑倒塌所致，但无法清理。1979年冬在划城岗清理了一座大溪文化较完整陶窑，结构分火道、火膛和出烟口三部分。火道高于火膛，呈斜坡状。火膛径约1米，窑壁尚存70—80厘米高，下半部在生土中挖出，上部用烧土垒成，没有窑箬，火膛周围有高30—40厘米，宽20厘米的平台，应是放置陶坯的地方。这种窑，不能严格密封，属较原始的结构。氏族公共墓地和住地相连，常在住地边沿（好几个遗址的墓地均在其西部边沿，不知是否是一种规律）。也有住地废弃了改作墓地的。或不挖坑，或仅挖浅坑，用文化层的灰土回填，一般难以找出墓坑。在埋葬方式上，有仰身直肢葬和屈肢葬。1959年大溪发掘的墓葬中有60座可辨葬式，其中仰身直肢葬占53.33%，屈肢葬占46.66%。特别是有一种极具特色的弯曲程度惊人的仰身蹲踞式葬法^⑧，在桂花树和丁家岗遗址的墓葬中，也有蹲踞式的。大溪墓地有母子合葬墓，桂花树有合葬的二次葬。小孩瓮棺葬具多为圜底釜上扣以钵、盆、碗。大溪文化的陶器为手制，流行泥条盘筑，不规范。晚期出现了慢轮修整。泥质红陶（主要是粗泥红陶）与黑陶、灰陶比较，占绝对的优势。泥质红陶和部分夹砂红陶表面磨光，施以鲜红或深红的陶衣，而器内为黑色，这是大溪文化陶器触目可见的特点。有彩陶。施彩于器表，特别是肩腹部，少数在口沿和圈足上，而不施于器内。多为红地黑彩，较晚时出现了白衣或橙黄衣上绘红、赭色彩。图案母题有漩涡纹、绚索纹、波浪纹、网纹、横人字纹、平行条纹、点纹等，与仰韶文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彩陶花纹有明显不同。装饰除彩绘外，尚多刻划、模印、拍印、压印、戳印、镂孔，有少量细绳纹。圈足器特别发达，同时有相当多的圜底器，与此相应的，有较多的陶器器座和支垫。平底器、豆形器、三足器都比较晚出，且数量不多。常见的器形有釜、盆、碗、盘、钵、罐、瓮、器盖等，三足器仅鼎一种。

长江中游的第三种原始文化是1956年湖北省文管会在天门石家河首次发现并进行发掘的^⑨。由于没有比较的材料，当时被视作屈家岭文化的晚期遗存。1958—1962年长办考古队直属队在汉水中游的湖北郧县和均县一带进行调查和发掘，在郧县的大寺、青龙泉、乱石滩等遗址中都发现了属于这种文化的地层^⑩，它们分别压在仰韶和屈家岭文化之上。当时将其归入龙山文化的范畴，但感觉到与豫、陕等地的龙山文化有所不同。1974年2月，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桂花树遗址采集了部分特点相似的文物，在试掘的三条探沟中，均发现了属于这一文化的地层。因为陶器的主要器形、质地、纹饰到制作方法等都与河南龙山文化接近，但又有一些各为对方所没有的典型器形，因此推断年代上应与河南龙山文化相当，文化面貌有共同之处，带有地方特点。在《湖北松滋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将其定名为湖北龙山文化。1975年，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平江献冲舵上坪遗址^⑪，证明这种文化的分布不局限于湖北境内，在湖南省北部、中部也有着广泛的分布，兼之河南同志所称的河南龙山文化下王岗类型大体上

也是一回事，所以有人主张将其名称扩大为“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也有人认为应依定名惯例，以较早发现的遗址命名，叫其为“青龙泉三期文化”。考虑到它的地域基本上包括了整个长江中游，文化内涵高度统一，加之龙山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似已成了代表一个特定时期（原始社会最末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共名，所以本文将采用“长江中游龙山文化”这个称谓。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除上述诸处外，还有均县乱石滩、郧县大寺、天门邓家湾、土城、渡闸、房县七里河、江陵蔡家台、龙王庙、张家山、沙市西沟、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宜昌中堡岛、当阳季家湖、松滋桂花树、圻春易家山^⑤、通城尧家林^⑥、湖南澧县王家岗、鸡叫城、道河、安乡度家岗、沅江酃湖石君山、华容时家岗、湘阴青山、长沙月亮山^⑦、湘乡岱子坪^⑧、平江枣仑、浏阳樟树潭^⑨、河南淅川下王岗、信阳阳山^⑩上蔡县十里铺^⑪、泌阳县板桥^⑫、唐河寨茨岗等^⑬。最近江西省在邻近湖南的萍乡赤山也发现了相似的文化遗存^⑭。这些遗址的发现表明它比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更要广阔，特别是其东北、南部边界，更向前推进了很多。

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特点是：石器除普通型、上窄下宽的石斧、扁平穿孔石铲（一种比屈家岭文化的窄长，一种更宽，但有肩）外，较多长方单孔或双孔石刀，扁平长条形和略似有段的石凿、石磷、三棱有铤、四棱有铤、有翼等多种形式的石箭镞。陶塑的动物种类、数量都很多，有兽类，也有禽类。石、陶网坠常有出土，这些都反映了原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也说明人们掌握了更有效的渔猎手段。

这一时期的墓葬。一般能见到长方形不规整的浅坑，葬式多单人仰身直肢，也有极少数的单人仰身屈肢和侧身屈肢葬。七里河有一定数量的合葬墓。青龙泉、乱石滩和七里河都发现有随葬猪下颚骨或猪头、鹿角，青龙泉有一座墓在人骨架左侧竟放置了14副猪颚骨，这和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的情况很相似，也许是受其影响。湘乡岱子坪遗址葬俗有较大不同，墓葬排列整齐，墓坑清楚规整，多为长仅1—1.2米，宽60—70厘米的土坑，内满是灰渣，草木灰和经过烧烤的破碎兽骨与随葬器物，似是二次葬。在多处遗址中发现将尸体随意掩埋在灰坑里，不置随葬品或仅置一、两件陶杯的现象。陶窑，在石家河遗址中有过发现，火道分直火道和“日”字形火道两种，是比较进步和复杂的形式。在舵上坪和划城岗遗址中都发现了房屋建筑遗迹，方形，或在地面下挖浅穴，再在其上支柱。或为地面建筑。面积十多平方米至二十平方米，有灶炕。舵上坪的房子中陶罐内有成百网坠，并有多件较完整陶器，说明一夫一妻家庭在经济生活中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陶器制作确定无疑地已经出现了轮制。蔡家台、季家湖、青龙泉、划城岗、度家岗等遗址的平底器上都留下了从快轮上切割形成的偏心圆痕迹。陶器依其用途向两个极端分化，即有粗糙、厚重的容、炊器，如尊、缸、锅等，又有小型、精致薄胎的食器。陶系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棕色陶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夹砂红陶。部分遗址中，夹砂红陶有占第一位的。一种泥质黄白陶是这一时期有特征的陶系。泥质磨光黑陶较少，多为小型精细器物，还有少量器表上浅红、桔红陶衣的泥质红陶。轮制虽已出现，但陶器多为手制。大型器常采用泥条盘筑，分段生产，接合处以泥条加筑一箍，成为带状和绳索状附加堆纹。小型器及款足器多用手捏。纹饰有拍印的篮纹、方格纹、绳纹，部分遗址出有为数不多、纹饰简单的彩陶和彩绘陶纺轮。彩陶图案有平行条纹和圆点纹，多施于橙黄陶上，彩为赭色或红色。彩绘纺轮多绘条纹和太极图式纹样。三足器和豆形器发达。平江献冲舵上坪遗址出土的三足器，主要是鼎，几占器物总数百分之四十^⑮。青龙泉遗址的豆占泥质陶器物的百分之十二^⑯。鼎，特多长扁平足和圆锥足、扁锥足的釜形、罐形和折腹盆形。扁平足上有脊棱和刻划、戳印纹，圆锥足和扁锥足上部常有深窝洞。鬻为主要的袋足器，且越往后越多，包括细长颈高裆和短颈高裆的捏流冲天鬻，不见东方沿海流行的卧式鬻。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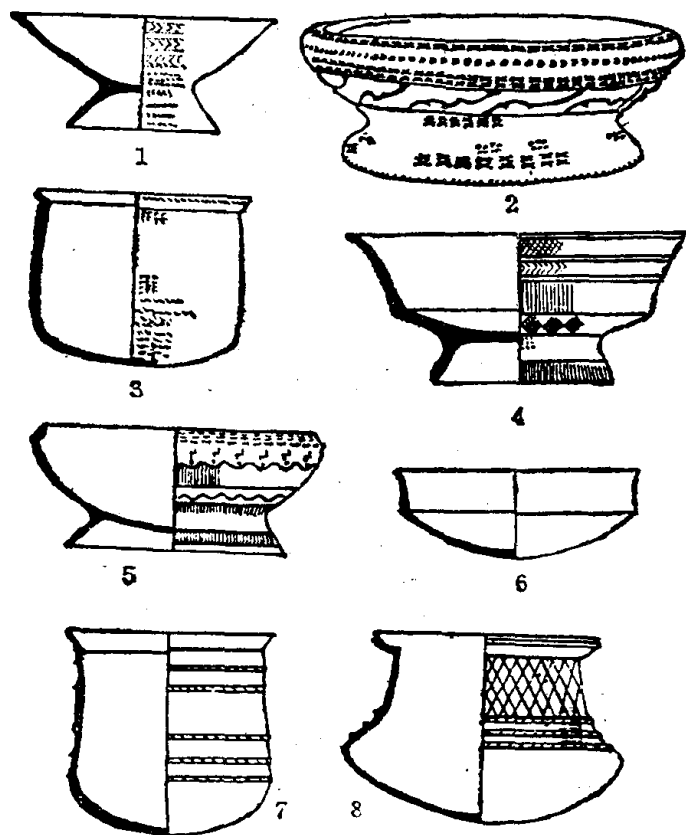
多为泥质红陶，釜手由小变大。部分遗址出有罍和盃，但不见鬲。高肥圈足的豆和矮肥圈足盘的数量较其它文化要多，灰陶质座上常有成排圆形，长方形缕孔，上部多为敞口浅盘，也有假腹的豆和盘。除此以外，典型的器物群还有：上部敞口盆形、下部筒形，内壁有刻划深槽、带流或不带流的平底澄滤器；平底或小凹底的厚胎红陶喇叭形杯；厚胎平卷沿浅折腹圈足盂；平底出边的钵和碗；敛口宽沿翻唇、接合棱角突出、口沿上有凹槽、平底或矮圈足的高领罐；最大腹径偏下，瘦长呈腰鼓形的罐；直口长颈折腹、喇叭形圈足黑陶壶；上下口较大，中间收束的器座和上口小、下口大，有各种缕孔的器座；粗厚胎直壁篮纹或方格纹平底缸等。

长江中游除以上所述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和本地区的龙山文化以外，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还分布有仰韶文化；在江西西北部还分布有山背文化；在鄂东还分布有包含着仰韶、青莲岗和大溪几种文化因素的黄岗螺蛳山类型的文化遗存；在湘西的沅水中游泸溪浦市一带分布着一种早期以戳印、压印、模印花纹为主，并有彩陶、白陶，较晚期以刻划、绳纹为主的一种地区性文化，在湘中、湘南则分布着和江西赣江流域有若干相似因素的古文化。但由于不带全局性，因此均未列入本文论述的范围。

二、长江中游原始文化的分期

长江中游三种主要的原始文化，各自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早、晚期之间在文化面貌上不能不呈现出若干明显的变异。由于近些年来工作的展开和扩大，使得更细致的分期工作有必要也有条件进行了。

关于大溪文化的分期，拙稿《试论大溪文化》^⑧，已进行了尝试。在进行这一分期工作时，笔者主要依凭了关庙山、红花套、汤家岗、划城岗、丁家岗等遗址发掘所提供的地层关系。这样将它分为了四期五段。第一期以汤家岗下层墓、丁家岗第一期遗存为代表；第二期以关庙



图一 大溪文化第一期典型器物

1. 盘 丁家岗 M3:2
2. 白陶盘 汤家岗 M1:2
3. 圆底罐 汤家岗 M4:6
4. 碗 汤家岗 M2:2
5. 盆 汤家岗 M5:3
6. 钵 丁家岗 M3:1
7. 釜 丁家岗 M3:3
8. 釜 丁家岗 T1(三):13